

动关系的经验教训等都需要深入总结。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正是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经济学理论有两种构建途径：一是通过假设—演绎构建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便是如此；二是从经济史中抽象出经济学理论，德国历史经济学就是从德国经济史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欧洲特别是英国经济史为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sup>①</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实践为源头，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它的研究任务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把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sup>②</sup>。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运用改革开放时

期的经济实践检验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另一个努力方向。

经济史学的“三求”功能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求真是求解和求用的基础，求解和求用是求真的升华。经济史研究既不能驻足于求真层面而拒不前行，也不能脱离求真而随意求解与求用，对历史真相把握得越深刻，对历史的解释就越有说服力，历史对现实的启迪和指导作用也就发挥得越充分。从“三求”功能来看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它有三大任务：一是向世人提供一部经济信史，二是对经济实践进行解释，三是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抽象理论以指导实践。以上三方面是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研究的路径，是新时代给学界提出的必答题。

（本文作者 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株洲 412007）

## 把历史感带回国企改革的研究之中<sup>\*</sup>

贾文娟

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社会体制的物质根基，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1978年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历史征程不仅反映出国家发展战略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一系列重大调整，而且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伟大实践。国企改革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领域的总体性现象，对国有企业进行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摒弃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反思脸谱化或本质主义取向的理论叙事，继而认识到国企本身及国企改革所具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然而，国企改革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研究者仅仅依靠阅读政策文件、档案文本很难完全弄清楚国家政策的推行过程、企业制度的变迁逻辑、行动者的互动方式以及职工的观念认知，遑论深挖国企的精神气质与改革的实践动力。这便需要研究者在掌握具体研究方法之外，

还要努力培养一种独特的历史感和洞察力，即将当下、过去与未来以及微观、中观与宏观加以联系思考的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需要从四个层面入手，将历史感带回国企研究之中：一是从微观层面的职工工作生活史切入，分析国企改革进程中行动者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二是从中观层面的制度史切入，探索相关组织制度的作用逻辑和动力机制；三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全局着眼，探究国企改革的政策实践；四是在了解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上认识国企改革的时代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页。

②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产业转型下国企劳资矛盾协调机制研究”（2017ESH004）的阶段性成果。

## 一、在生活世界中探求国企改革的微观历史

研究历史是为了凝视曾发生过且正在发生着的变化，继而突破某种决定论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否认中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独特性，也不能将这种独特性仅仅归因于所有制、产权结构和国家力量。自历史长河而来并向未来奔去的国有企业，代表了特定的经济气质、行为准则、实践方式与文化形态，研究者需要从人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去发现国企的复杂性，并追问社会主义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交叠是怎样推动国有企业领域的重要变迁的。

国企职工的工作生活可以被视为一种有着独特精神气质的实践行动，并嵌入人们称之为“组织”的错综复杂的科层结构、机构关联、技术变革与人事关系。但若要深究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则不仅需要采取“厚层描述”的方法，将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放入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氛围中，而且需要发现那些对人们工作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关键性事件，并及时进行深入剖析。<sup>①</sup>

以学界对国企改革前后主人翁精神的讨论为例。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精神体现为“以厂为家”，工人会通过“工厂是你的，也是我的”这种话语来表达自己对企业的朴素情感。到了市场改革时期，不少研究曾指出，面对着国企改革中出现的腐败问题，职工的主人翁精神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护厂行为。这时，职工往往在诸如“国企不是我的，但也不是你的”等话语表达之下，怒斥各种盗取国有资产的行径。<sup>②</sup>时至当下，主人翁精神转变成在市场契约下的职工要求通过工资提升、福利再分配、员工持股等多种方式来共享国企的发展。可以说，主人翁精神的实质是职工对“个人—企业—国家”这一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但这种精神的具体内容和表现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实在时，研究者需要就某个问题从具体的工作生活之中发掘出历史性的关联。

可见，第一个层面的历史感是出于对国企职工工作生活变迁之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当然，对微观历史感的获得既需要进行大量档案查阅、

口述史、深度访谈甚至重返田野、拜访故地，亦需要查阅学术文献，但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韦伯将社会实在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指出“这种文化生活处于普遍的、但仍然个别地形成的联系中”<sup>③</sup>。这意味着研究者寻求因果解释时，需要将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研究对象建立起价值关联，继而在时间与空间的拓展中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在状态，以探究其行为背后的种种意涵<sup>④</sup>。

## 二、从组织层面理解国企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如果将生活世界看作国企历史变迁的根基与土壤，那么溯源而上的研究还应思考国企内部各种组织制度的变迁。也就是说，哪些制度得到了延续、哪些制度发生了变化、哪些制度逐渐隐退等问题亦需要纳入分析之中。当然，人们总是能直观地感受到制度变化的影响，但研究者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制度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与组织结果。

把握制度层面的历史感需要一个合适的着力点，单位制研究则能够成为这个着力点。单位制研究的旨趣主要是理解中国城市中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sup>⑤</sup>。比如有国外学者就认为，单位制下的企业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再分配单位，其中工人对国家、企业和直接领导存在三重依附关系，这就使单位内部形成了以“依附—庇护”关系和“有原则的任人唯亲”文化等构成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继而形

① 李怀印等《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② 参见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Chen, Feng, “Subsistence Crisi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7, 2000; Lee, Ching-Kwan,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③ (德) 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④ (美) 麦克·布洛维著，沈原等译《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3—105页。

⑤ 李路路等《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

塑了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基本形态<sup>①</sup>。之后，学界的关注点从单位制的运作逻辑转向了单位制的变迁，如指出改革开放后，单位原有的多样化功能越来越收缩为个人的职位和工作场所<sup>②</sup>；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发展出了以“内部化管理为主”的“新单位制”<sup>③</sup>；等等。

此外，学界对国企改革前后职代会作用的研究亦值得借鉴。如有研究者就指出，职代会研究的目的是探查“政行合一制”下的企业员工利益组织化的独特样式及其对于宏观和微观政治秩序的结构作用，而不是将其视为与西方工会同等的劳工利益组织机构<sup>④</sup>。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将历史制度主义视野纳入对职代会作用的分析，通过对G市A厂1949年至2010年组织的90次职代会的频次、时长、代表构成、内容等因素的分析，发现企业职代会的实践历程是由合法性逻辑与效率逻辑间的张力构成的，当企业合法性压力大时，职代会实践较为活跃，而在企业效率压力大时则较为仪式化<sup>⑤</sup>。这一研究表明，若欲洞察特定制度运作的真实逻辑，就不能仅靠查阅某个时期的政策文本，更需要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通过将研究对象置放于足够长的历史时期中观察制度实践的微妙变化，并从制度变化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发现推动其变迁的动力机制。

### 三、从改革开放的国家征程看国企改革的经验实践

国企改革的诸多问题都直指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核心，国企改革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与中国各领域改革之间存在着彼此纠缠、相互影响、交错推进的关系。对国有企业的深入研究，要求研究者将历史感继续拓展到民族国家发展的层面，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辩证过程中理解国企改革的政策实践。

从政策变迁角度看，一般认为中国国企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年到1992年是放权让利阶段，国有企业的生产获得了相对自主性；1992年到1997年是公司制改革阶段，国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1998年到2010年是股份制改造与产权制度改革阶段，国家行政权力对企业利益分配的介入受

到进一步限制；2010年后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深化国企改革阶段，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得到进一步落实。但这种“阶段论”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认识到国企改革与中国整体改革间的辩证关系。

倒逼机制是理解这种辩证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倒逼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sup>⑥</sup>。将视野从国企车间移到民族国家，我们便可以洞悉在形势倒逼下国企改革所具有的无可回避的悲壮性。实际上，因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稳定，国家对国企改革的推进是渐进且审慎的。譬如，在80年代，中国出于国情考虑并未效仿“全面改革”的东欧模式，而是在渐进式改革中将国企置放于受保护的内核：既通过“利改税”等政策来强健国企自身，又通过“价格双轨制”在体制外构筑起竞争性市场，通过自外而内的市场压力破除“软预算约束”的魔咒。但尽管如此，国企改革行至第三阶段仍进入了艰难时刻，尤其是1998年至2002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将诸多国有企业逼入破产境地，大量国企工人面临失业危机，中国改革也遭遇阻力。然而，经历了这个“壮士断腕”的过程，中国最终确立起在深化改革之中不断探索和解决新老问题的实践路径。

可见，第三个层面的历史感要求研究者认识到国企改革与其他诸领域改革存在的复杂关系，并在对诸种关系的理解中形成对诸如职工劳动、组织制度、国企传统等具体问题更加准确的判断。

① (美) 华尔德著，龚小夏译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7、183页。

② 李汉林 《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社会》2008年第3期。

③ 刘平等 《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④ 张静 《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工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⑤ 蔡禾、李晚莲 《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研究——一个案例厂的六十年变迁》，《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

⑥ 李友梅 《“倒逼”机制与改革开放的推进》，《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 四、从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理解国有企业的时代意义

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既嵌入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亦嵌入世界政治经济的风云变幻。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与时代意义随着世界形势而变动。与此相随，研究者还需要从世界大势的风云变幻中洞察中国国企的时代意义。在这一维度，有三条线索值得关注。

其一，研究改革开放前的国企生产实践，需要关注美苏冷战的影响。这意味着研究者要关注中苏关系的变动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影响，如温铁军曾将苏联对中国投资状况的变化作为理解中国工业生产从“全盘苏化”转变为“人海战术”的重要因素<sup>①</sup>。研究者也要关注中国国企在应对诸如效率与均等之间的矛盾、技术变迁的动力等问题的具体方法上与苏东模式所存在的差异。

其二，研究国企改革的历史进程需要关注全球资本主义模式变迁的影响。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全球资本主义经历了管理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其中管理资本主义注重劳动与剩余价值的产生，福利资本主义注重再分配的力量与企业社会责任，金融资本主义注重资本配置与股东价值<sup>②</sup>。依此来看，90年代后的国企改革恰好处于从福利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进程中，这种变迁与社会主义转型的碰撞对国企改革造成的实际影响亦需要在研究中得到恰当而充分的反映。

其三，研究深化国企改革的新征程，需要对当下全球化进程的转变予以关注。在80年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国企主要是从产业链低端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跨国劳动过程，继而采取弹性积累的生产方式<sup>③</sup>。但随着国有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海外投资的增加，中国国企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企对其他地区的多元影响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国企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亦应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

综上，探索国有企业时代意义的变迁需要将企业发展状况与更广阔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结合起来加以思考。而这种思考显然要求研究者打破学科藩篱，广泛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对相关议题的分析与见解，从古今中外的综合联系中寻求对国企及其历史诸问题的解答。

#### 五、余论

“社会科学所处理的问题关乎人生，关乎历史，也关乎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交织。”<sup>④</sup>如果将国企改革研究放置于社会科学的脉络中，那么很显然，国企改革当然关乎个体的人生际遇、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以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发展。正是基于此，本文所述的“历史感”并不是在研究方法意义上对档案文书、政策文件的运用，而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将个体生命历程与整体社会变迁、将曾经的渴望与未来的期待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意愿。把历史感带回国企改革研究之中，要求研究者在对特定问题进行分析时，既能看到个体微观生活史、企业组织制度史，又能看到国家政策发展史与全球政治经济变迁史，并在具体研究议题中将“自上而下”与“由小见大”的视野综合起来，在对不同层面的历史进行综合判断之中，对那些“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sup>⑤</sup>作出掷地有声的学术回应。

(本文作者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上海 200444)

① 温铁军等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44、55页。

② 参见〔美〕何柔宛著，崔航宇等译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6—68页；杨典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社会》2018年第2期。

③ 贾文娟 《双重大转型下的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模式变迁》，《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④ 〔美〕C.赖特·米尔斯著，李康译 《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

⑤ 〔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3页。